



冯陈祖怡之新图书馆观实践探微

□ 蒋秀丽*

摘要 冯陈祖怡是近代中国最早赴海外研修图书馆学的女留学生。她归国后致力于图书馆事业,执掌过多种类型图书馆,积极参与各种图书馆协会的创建与活动,是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开拓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此文梳理了她在拓展图书馆教育职能、重视图书馆人才培养、创新中文编目方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以期为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冯陈祖怡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协会 中西文化交流 新图书馆运动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3.016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活跃在中国图书馆舞台上的女性图书馆员寥若晨星,接受过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国女性图书馆员更是凤毛麟角,“国内从事图书馆的人,虽是很多,但女子还不满十余人”^[1],冯陈祖怡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冯陈祖怡,福建人,原名陈祖怡,号振铎,冯为其婚后夫姓,1917—1919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研修图书馆学,与沈祖荣、刘国钧、戴志骞等同属“中国近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第一代拓荒者”^[2],“我国女界中之第一人”^[3],回国后执掌过多家长图书馆,1919年9月至1920年,首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12月至1928年9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京高师)图书馆馆长,期间,积极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的创建与活动;1928年10月至1937年,历任中法大学图书馆副主任、主任,1934年10月10日兼任中国国际图书馆上海分馆馆长,举办了世界图书馆展览会,1935年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大会,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向国际化,其成就颇受学术界重视。

然而,有关其本人的研究却很匮乏。用关键词

“冯陈祖怡”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仅检出3篇相关论文。其中,陈碧香在《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先驱冯陈祖怡研究》一文中对冯陈祖怡的生平和简历进行了介绍^[4];姬秀丽在《对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先驱冯陈祖怡的再研究——与陈碧香女士的商榷及补正》一文中对其生平和职业经历进行了补正^[5];刘劲松和符夏莹在《冯陈祖怡的图书馆思想与实践论略》一文中对其社会本位图书馆服务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宏观上的概述和总结^[6],虽是面面俱到,但重点之处诸如民众图书馆观、图书馆协作观、如何培养专业人才,及其对北京高师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实践等尚有待深挖。本文聚焦于冯陈祖怡拓展图书馆教育职能、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创新图书馆建设与管理、促进图书馆文化交流等几个重点领域,通过对史料的深度挖掘与细致梳理,力图从微观层面回答冯陈祖怡是如何将其对于新图书馆运动的独到见解落实到具体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中的。

1 按类设馆发展教育

冯陈祖怡对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有独到见解,认为“人为理性之生活,除去衣食住,还应求知能之发展;发展知能之唯一利器,厥为教育,图书馆在教育上之地位,久为各国教育家所公认;以其能辅助

* 蒋秀丽, ORCID: 0000-0002-5498-870x, 邮箱: jiangxiuli@sdu.edu.cn。



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也。我国正式教育方在萌芽,图书馆教育亦急宜发展”^[7];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接受教育的条件也不同,自然造成其在认知上的不平等,惟图书方可增进文化,弥补不足与缺憾;主张设置不同类型图书馆,以满足不同群体需求^[7]。具体包括:

(1)为粗通文字的劳动群体设置通俗图书馆。体力劳动者多因失学而缺乏常识,为求温饱,常是“耳不闻有道之言,目不见可法之事,懦者留为下愚,强者颇为盗贼”。若由图书馆平日对其进行熏陶与诱导,则社会秩序进化于无形,若再以通俗浅说启发其智慧,通俗演讲涵养其德行,“随嗜而读可以自娱,不尤愈于怨穷则咨嗟叹息也”^[8],若专门研习,学以致用,更可振奋其精神,提升其地位,维持其人道与自尊。

(2)为儿童专设儿童图书馆。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儿童,其知识教育只能依靠图书馆,即便是生活富裕有条件上学的儿童,其家庭也未必都能为其准备完善的自修设备。儿童图书馆可将多数儿童聚集一起进行引导与智力开发,借助迎合儿童心理、有益身心健康的图画、幻灯等,培养其兴趣,开发其自动力,教育功效会更好。

(3)为学生设置学校图书馆。课堂只能为学生提供指导,而“阐发精理”则全靠学生自主学习。欧美各国学校自高中以后,就减少正课而增加课外阅读量。我国厉行新教学方法,也提倡自主学习。图书馆是提供自学的唯一利器,规模较大学校皆宜尽早设立。

(4)为毕业生设普通图书馆,以延续学校教育之效。学生毕业后,除少数从事服务学校事业者之外,其他职业者很少再有学习与修身养性之机会与场所,若无正当娱乐活动,难免会流弊层生,其在校时的有限之学理难敌社会上的无限之习俗,“欲自保持永久且不可得,更无论改良社会矣”。

(5)为女子开设图书馆。自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开始,女子教育虽已施行十年有余,但收效甚微,能接受教育的女子依然是寥寥无几。多数受过教育的女子,虽然其在校时有强烈的研究学术之精神与意愿,

但为人妻母后不久便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的资本,原因在于社会教育缺乏,难抵习俗,原有知识退化,教育效能尽失。而未曾进过校门者更是终身不闻教育,“浑浑以生悠悠以残”。此乃女子之不幸,国家社会之不幸。

(6)为学者设专门图书馆。学术研究之专业用书种类繁多、价格昂贵,仅凭学者个人能力无法悉数购置。专门图书馆可集中财力购置专业用书,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源,且可聚同类之学者而研究同类之学问,获事半功倍之效。

(7)为乡村开设乡村图书馆,配备常识性的知识和浅显易懂的图书,培养民众农事演讲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8)为交通不便或者无法亲赴图书馆者,设流动图书馆,由图书馆“为之运送,尽能力之所及,以推广其效力”。

总之,冯陈祖怡为不同群体设置不同的图书馆、开发不同群体知能、实现不同的社会教育功能之图书馆分类思想,丰富了图书馆的类型,拓宽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范畴,也提高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价值与功效。

2 内外兼修培养人才

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不长,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如古籍分类编目无统一标准,各馆各行其是,统一管理难,读者利用也不便。20世纪初,我国曾经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浪潮,但效果甚微,原因之一在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缺乏。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图书馆事业迅猛发展,各种类型图书馆数量激增,但人才缺乏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影响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不是藏书楼,图书馆员也不只是管书,还应指导读者利用。而当时的现状是“图书馆对于读者未能充分指导,非不愿发挥效用,病在图书馆教育之师资不可多得,人才缺乏也”^[8]。

冯陈祖怡认为,图书馆员应以曾受过专门训练、熟悉教育者来担当,要重视人才培养,并撰文详述人才培养方法:“男女师范之最终学年,应设图书馆普通科,专此养成师资,以为指导中小学生利用图书馆之预备。高等师范及大学附设专修科,专修科毕业资格介于普通科与专门之间,专为造成助理人才。设专门学校(及单科大学),专门毕业经实习后,得为



馆长。其应习之学科,按美国图书馆学校所规定者”^[7],包括建筑法、组织法、监视法等图书馆管理与行政,选书法、目录学、分类法、购书法、图书解析法、书架排列法等技术实务操作;成立讲习会,专门吸收现时任职图书馆员以便制定和促进图书馆界统一的工作规范和业务流程;组织图书馆协会,以增进相互沟通和信息共享、图谋图书馆界共同进步;派遣留学生借鉴和汲取先进国家之成法,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资源,她呼吁:“夫国家之施教,固希望有特才之产出,而尤应注意多数知识之平等;此图书馆教育之所以急宜发展也,愿教育家共起而提倡之”^[7]。

1923年,冯陈祖怡与陆秀联署“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留学图书馆学额培植师资案”,提出“急行筹备设立图书馆专门学校,以广育人才,普及全国图书馆事业”“取先进国以为鉴镜”“遣派留学外国”“每年派送留学名额内,加派图书馆科”“人才归国后,或任教师,或办图书馆,应实行负责”^[9],是国内公开倡导派遣图书馆学留学生的第一人。虽然该提案只被收纳并未实行,但为我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埋下了希望的种子。1946年,教育部在选拔留学人员时录取了3名图书馆学专业学生^[10]。

1927年12月,《图书馆条例》公布,其中对馆长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有明确规定:“馆长应具左列资格之一:一、国内外图书馆专科毕业生,二、在图书馆服务三年以上而有成绩者,三、对于图书馆事务有相当学识及经验者”^[11],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员已经开始从职业化向专业化迈步,也恰恰呼应了冯陈祖怡上述提出的设专门学校(及单科大学),专门毕业经实习后得为馆长的人才培养计划与方法。1939年,教育部第一七〇五五号训令颁布了《修正图书馆规程》,明确规定了省市立及县市立图书馆馆长、各部主任及干事的任职资格^[12],正式确立了我国图书馆员专业化和分类要求原则,冯陈祖怡之人才培养思想基本得以实现。

3 困境中发展创新

学校图书馆能否发展,除学校确立正确的领属关系外,还在于有没有聘用一位精通业务的馆长。北京高师图书馆能够在困境中艰苦跋涉,不能不提为该馆建设呕心沥血的女馆长冯陈祖怡,履职8年,为图书馆立下了“汗马功劳”^[13]。

1919年9月,冯陈祖怡首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草创之初图书馆经费短缺,“书籍缺乏”^[14],在任数月,举步维艰,不得已于1920年春辞职,先任北京高师教授,后兼图书馆馆长^[15],履职后首先严抓日常管理和业务规范,“除修订原有规则誊录登记总簿外,拟将现行分类法改为最通行之杜威分类法,将现行固定式 Fixed Location 之书架排列法,改为连属式 Relative Location 之排列法”^[16],主持编制了多种中英文事务表册,包括购书手续用片、登录手续用片、出纳用片、目录检查用片等,同时,参与新馆筹建,馆务工作呈现出“向上之精神,力求进步”^[16]的局面。

3.1 筹建新馆

北京高师图书馆“始就本校居中楼房”^[17],“楼上装书,下设阅览室”^[18],面积小,馆藏少,无法满足学生需求。校长邓芝园对图书馆之于学生及教育前途之重要性认识深刻,图谋扩大图书馆,而由普通楼房改造而成的旧馆,根本无法扩充,便决计筹建独立新馆,并“于每月行政费项下竭力撙节得三万余元,以规定新图书馆之计划”^[16]。

有了经费之后,邓芝园便请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主持规划,聘用德、美、丹麦三国的四位建筑学专家、电器设计师进行独立馆舍的图纸设计^[19],从动工兴建到新馆落成仅用1年,冯陈祖怡全程配合。

新馆规模与设计超前,“纵72尺、横75尺,楼高两级,书库四层”^[16]。下层为目录室、杂志室、公共阅览室;上层为各部研究室与演讲室,能馆藏十万卷书、容纳五百人^[16],之后多年图书馆一直是该校的标志性建筑,为师生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图书馆改进服务提供了必要条件。有学生回忆说:“后来学校又建筑了一座新图书馆,是座方楼,规模比旧馆大,装书也比以前逐渐加多。新馆长是冯陈祖怡女士”^{[18](137)}。

3.2 加强馆藏建设

1920年12月,冯陈祖怡入职馆长时馆藏为:中文旧书655部959册、中文新书2205部3424册、英文书籍3326册、日文书籍2336部2863册、德文书籍101册、法文书籍2221册^[16]。

1922年,图书馆被划归总务处,由总务长直接领导,意味着学校将图书馆排除出了教学序列,完全忽略了其教育职能而降低为藏书库^{[19](73-74)},无独立



经费,从学校办公经费中划拨的经费额度不定,图书经费严重不足,馆藏建设捉襟见肘。

困境中冯陈祖怡艰苦跋涉,创造条件购买图书,丰富馆藏,新增中文旧籍 193 部、中文新籍 222 部 258 册、英文书籍 1059 册、日文书籍 24 部 54 册^[16]。到 1922 年底,馆藏图书中文 3375 部 4882 册、日文 2360 部 2917 册、英文 4395 册、德文 101 册、法文 22 册^{[13](30)}。

3.3 创新中文编目法

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之风,外文图书大量涌来,传统上的“四分法”已不能完全适应编目需要。1918 年,沈祖荣提出“仿杜威法”主张,引起目录编制大讨论,杜定友、查修、王云五等业界专家“皆受杜威之影响,而宗旨各殊,类目迥异,擷其特色”^[20]。

沈祖荣与胡庆生合编《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为仿杜之最早者,虽然注意到了杜威之重宗教、语言且赋予中国书之号码过少且小的缺陷与不足,只用其“十进”之意而完全不守其部类名次,但依然陷入“十进”固定模式中,不能真正按文献和学术实际为基础。查修的分类法保留了杜威法中大部分类目,虽稍微有所变通,开辟了新类目,能多收一些中国文献,但总体仍未以中国文献为着眼点,存在古今中外文献分类之别。王云五为不改动杜威成法而在分类号之前增加特殊符号及号码以容纳中国之书者,虽然能多收录一些中国文献,但中外图书并列、大小不致颠倒,打破了分类法的系统性,也不便读者查阅^[21]。

冯陈祖怡认为图书编目实际上有两大区别:一是按性质分;一是按文字分。依新式目录法,按性质区分,如分类目录、分析目录;按文字分,如书名目录、人名目录,中文编目之困难在于,两项兼而有之,“按性质区分,或取法四库目录,或仿杜威氏法,虽取法不一,尚可应用。致划一分类方法。虽为吾人所切望,然比较复杂而深奥……西书文字目录之编制,向用字母 Alphabetic 排列,中文格于文字之异,不能仿用”^[22]。

她调研分析当时使用的中文编目排列方法,总结主要有以下五种: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按笔画优先排列、按笔画多少排列、按汉字附加罗马拼音从罗马字母排列、按汉字附加注音字母拼音从注音字母排列,虽然不敢臆断何者最为适用,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标准:前三者主“形”;后二者主“音”。“近人因赏西文字母排列式之便利,遂有译音之尝试,即

汉字附加罗马字,及附加注音字母”^[22],虽然用心良苦,只可惜太费周折,编之者也多烦劳,用之者又不易习惯。因此,她认为前三者较为稳妥,然亦各有所长:

(1)《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法,以固有之法治固有之学,最为合理。《康熙字典》为我国治学者通用,无论精通儒学者还是初学者,均能适用,虽有冷僻汉字,所属部首也不易记忆,然而经过训练,再列表说明,必能使用者得心应手;(2)以笔画先后排列法比较新颖,学起来亦不难,只是除了检用图书馆目录外,无其他相当之融会;(3)按笔画多少排列法,最通俗,凡识字者都能用,但方法太简单,若遇同笔画字太多,需借助细目来辅助;而细目标准仍采用部首法。以上三种除了(2)为新法之外,其余两种方法实质相同,区别在于一个在纲,一个在目:若以部首分类,则部首为总纲,笔画数为细目;若以笔画数多少分类,则笔画数为总纲,部首为细目。^[22]

结合部首和笔画排列法进行中文编目,是冯陈祖怡的创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制体系大概受此启发。

4 立足国内走向世界

4.1 推动国内馆际合作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客观上要求图书馆间联合与协作。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界的联合体,冯陈祖怡积极参与创建多个协会与活动,推动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是我国图书馆界人士第一次全国范围大联合,1922 年成立,第二年 8 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第二届年会。冯陈祖怡携同事 30 人前往,会上与洪有丰、韦棣华等提出“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全国各公立图书馆将所藏善本及一切书籍严加整理布置酌量开放免除收费案”^[23],针对各图书馆重保存、轻流通、“大率秘而不宣,致学者无研究之机会。国学何由而昌,我中华固有文化因之而衰”^[23]之状况,提出包括善本书籍开放、开卷陈列、阅览免费等办法,对昌盛国学意义重大,体现了现代图书馆开放管理理念。具体包括:

(1)在六个月内,由本社将此案函请各省省长转知该属图书馆委员会,或其他管理该



属图书馆团体机关,从速整理图书馆事业;
(2)善本书籍宜存列玻璃架内,如遇人来馆中
请阅览,当酌许之;(3)宜由馆中雇员影印,或
任人抄写,以广流传;(4)如遇人来馆申请借
阅时,倘得相当介绍,当酌许之;(5)仿博物院
陈列法,选择数部,开卷陈列;非但供人浏览研
求,是亦引人入胜之一法。并于每周或每月轮
换一次;(6)易收费限制,为保证限制。各公立
图书馆应备有阅览券。凡受有保证者,径可领
取,凭券入览。^[23]

北京图书馆协会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图书馆界学
术组织。1918年12月28日,北京地区20余名专家
和图书馆馆员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
选举袁同礼为会长、李大钊为中文书记,“并提出开
展各馆互借图书,互换出版物等业务活动。但由于
教育部未批准,加以经费困难,不久即停顿”^[24]。
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敦请戴志骞发起并组织成
立北京图书馆协会。同年3月16日,冯陈祖怡、戴
志骞等人召开筹备会,议决于3月30日召开成立大
会,并拟定协会宗旨为“图谋北京各界图书馆间之协
助互益”^[25]。在30日成立大会上,戴志骞、冯陈祖
怡当选正副会长^[26]。会后,冯陈祖怡认真履职,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在5月18日常会上,她发表了题
为《中文目录编制问题》的演讲,并出版了一期《北平
图书馆协会会刊》以促进学术交流。1929年,北京
图书馆协会改组为北平图书馆协会。1931年6月
14日召开常会,重新分配执委日常会务,“将会务分
为六项,各推一人负责……交际冯陈祖怡”^[27]。
1936年10月24日召开第三次常会,刚从欧洲归来的
冯陈祖怡跟与会代表分享了其“欧游对于图书馆
之印象与感想”^[28]。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全国独立性的图书馆界学术
事业机构,在中国近代图书馆界专业协会组织中最
具影响力。冯陈祖怡全程参与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
创建与运作。1920年,北京高师图书馆首次举办图
书馆学讲习会,首次提出全国图书馆组织问题。在
闭幕式上,沈祖荣、戴志骞、冯陈祖怡等均提出“筹
建设立图书馆协会以谋本国图书馆教育的发达为重
要”^[29]这一议题并展开讨论。冯陈祖怡希望成立图
书馆协会、多设立图书馆、重视研究妇孺图书馆问
题等。会议将图书馆教育列为重要议题,并在此基
础上酝酿了全国图书馆协会组建相关问题。1925年4

月25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襄助下,中华图书
馆协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6月2日在北京举行成
立仪式大会,会上鸿儒云集,专家荟萃,梁启超、韦
棣华、教育总长等均到会并发表演说^[30],冯陈祖怡
当选执行委员、《图书馆学季刊》编辑部成员。1929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举办第一届年会,冯陈祖怡当选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代表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组织的欢迎会上致谢,建议“借党部之力命下属附
设图书馆或阅览室,并恳请党方倡导中央图书馆统
一分类编目、确定学科分类标准”等^[31]。在1933
年8月第二届年会上,她“介绍一种排架编目法、
审定美国原版《杜威十进分类法》”,并提出“为
推广民众教育拟请本会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案”^[32],
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谋发展。

1930年,冯陈祖怡协助宋景祁编辑《中国图书
馆界名人录》,书中介绍了图书馆界423位名人的
概况。1934年,她调研了上海80余所图书馆的概
况,编撰了《上海图书馆概览》。这两本书,不仅为
当时的馆际合作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学者研究中
国近代图书馆史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为使国内各
图书馆“一凡他馆所已进行者则不再从事,凡他馆
所具备者则量力补充,俾收分工合作之效而期有当
于文化上之贡献”^[33],她先后撰写了《北京高师图
书馆沿革纪略及新图书馆》《中法大学图书馆概况》
《中国国际图书馆总分馆组织及工作》等文章,为图
书馆间沟通与合作提供方便。

4.2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冯陈祖怡积极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尤其在上海
中国国际图书馆任职期间,贡献卓越。

“中国国际图书馆创办人为蔡元培、蒋中正……
初筹备于民国二十一年,其欧洲之部在日内瓦,为
总馆,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馆长胡天石;中国之部
在上海,为分馆,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其组织方式
与总馆一致,首任馆长冯陈祖怡”^[34]。中国国际图
书馆宗旨是“传达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于世界,以期
各国多数人士对于中国有真确之认识,同时介绍西
方学者关于中国国际学术之研究,期待沟通中西文
化较大之效率”^[34]。1934年10月10日上海中国
国际图书馆成立之日,冯陈祖怡汇报了该馆筹备经
过,并举办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促进了中西文化交
流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上海世界图书馆展览会规模空前,前来参展的有



美、英、德、法等16国50余家图书馆^[35],展品丰富,琳琅满目,蔚为壮观,吸引多家媒体前来报道宣传。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申报》评价其为“洵属我国图书馆之创举,颇足以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36]。

1934年11月1—7日,应华北各界要求,在北京举办了世界各国图书馆展览会,展品全部来自上海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为保证展品安全抵京,冯陈祖怡随同展品一起北上,亲临现场指导展览会事宜。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展品陈列状况及筹办人员合影见图1。“展览会颇得各方好评,不仅有益于中国图书馆运动,并为沟通国际文化之先声”^[34]。



图1 1934年“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举办
(图为筹办展览会人员及冯陈祖怡女士^[37])

1934年底,冯陈祖怡前往瑞士为中国国际图书馆添购图书、扩大组织,又扛起了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重任。1935年,在第八届IFLA年会上,她代表中国国际图书馆向大会介绍该馆概况,把中国图书馆事业向国际社会做了一次成功展示^[38],在传承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交流合作方面,图书馆也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5 结语

冯陈祖怡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女性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实践家,是最早到海外研修图书馆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归国后致力于图书馆事业,在拓展图书馆教育职能、培养专业人才、创新中文编目方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图书馆分类思想和教育观,拓宽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范畴,在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时代,为中国民众寻求到了精神乐土。她对阅读的精神追求和“随嗜而读”观,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她首次公开倡导派遣图书馆学留学生,有力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员职业专业化的发展进程。她所推行的

一系列图书馆管理方法与举措,为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她在中国空前软弱、中西方之间无法构成对等关系之时,放眼世界,不遗余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将我国图书馆事业推向新纪元,引领我国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化图书馆转型。

因此,冯陈祖怡在中国图书馆界的作用和地位在中华民国时期便已得到公认。在宋景祁等编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樊荫南编纂的《当代中国名人录》中,她与中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沈祖荣等人同时在册,足见其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影响之巨大、作用之重要。

参考文献

- 杜定友.图书馆与女子职业[J].妇女杂志,1928,14(4):5—8.
- 韦庆媛.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36(3):102—118.
- 宋景祁.中国图书馆名人录[M].上海:上海图书馆协会,1930:111.
- 陈碧香.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先驱冯陈祖怡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2):101—104.
- 姬秀丽.对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先驱冯陈祖怡的再研究——与陈碧香女士的商榷及补正[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6):109—112.
- 刘劲松,符夏莹.冯陈祖怡的图书馆思想与实践论略[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7,26(5):106—113.
- 冯陈祖怡.图书馆教育急宜发展之理由及其计划[J].教育丛刊,1923(6):4—9.
- 冯陈祖怡.图书馆之责任与人生[J].上海图书馆协会,1929(9):2.
- 冯陈祖怡,陆秀.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留学图书馆学额培植师资案[J].新教育,1923(2—3):316—317.
- 教育部留学考试录取图书馆学三名[J].中华图书馆学协会会报,1946(4—6):9.
- 中央教育法令:甲、条例:图书馆条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布)[J].大学院公报,1928(1):32—35.
- 修正图书馆规程[J].浙江省政府公报,1939(3179):7—8.
-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纪念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5.
- 天津市图书馆志编修委员会.天津市图书馆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352.
- 樊荫南.当代中国中名人录[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327.
- 冯陈祖怡.北京高师图书馆沿革纪略及新图书馆[J].教育丛刊,1923,3(6):3—4.
- 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1918[M]//朱有瓚,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87.
- 李希章.北高生活片段[M]//《学府丛刊》编辑组.学府丛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37.
- 董乃强.中国高等师范图书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50—74.
-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5—117.
- 倪梁鸣.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成就[D].合肥:安徽大学,2007:56—58.



- 22 冯陈祖怡.中文目录编制问题[J].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1924(1):54-57.
- 23 洪有丰,冯陈祖怡,韦棣华.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全国各公立图书馆将所藏善本及一切书籍严加整理布置酌量开放免除收费案[J].新教育,1923(2-3):308-309.
- 24 张树华.北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四)[J].大学图书馆学报,1990(4):53-62.
- 25 筹备北京图书馆协会开会纪[N].新闻报,1924-03-21(19).
- 26 各省教育界杂讯[N].申报,1924-04-06(10).
- 27 本刊讯.北平图书馆协会常会[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6(6):17.
- 28 国内消息.北平图书馆协会三次常会[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6,12(3):18-19.
- 29 曹配言.北高图书馆讲习会闭幕式志盛[N].晨报,1920-08-21(7).
- 30 中华图书馆协会之进行[N].申报,1925-05-29(11).
- 31 中华图书馆协会闭幕[N].申报,1929-02-03(19).
- 32 冯陈祖怡,张桂田,何日章,等.为推广民众教育拟请本会组织民

- 众教育委员会案[C].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1933:37-38.
- 33 冯陈祖怡.上海图书馆概览[M].上海:世界书局,1934:1.
- 34 冯陈祖怡.中国国际图书馆组织系统及经过:沪分馆馆长冯陈祖怡谈话[J].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4(4-6):23.
- 35 世界图书馆在沪展览[J].青岛教育,1934,2(5):8-10.
- 36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今日开幕开展览[N].申报,1934-10-10(20).
- 37 高九洲.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举办之世界图书馆展览会[J].北晨画刊,1934,2(13):1.
- 38 邱东江等.国际图联(IFLA)与中国图书馆事业(下)[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2:4-5.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济南,250100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19日

修回日期:2021年12月1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Microscopic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T. Y. Feng-Chen's New Library View

Jiang Xiuli

Abstract: T. Y. Feng-Chen is the earliest female student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abroad in the modern China.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she devoted herself to librarianship, took charge of various types of libraries,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activities of various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active promoters of the modern New Library Move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he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expanding library education func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library talent training, innovating Chinese cataloguing method and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ies.

Keywords: T. Y. Feng-Chen; Library Management; Library Association; East and West Culture Communication; New Library Movement

《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2022年4月23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俗称世界读书日),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锦贵教授的《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精装,上下卷)。该书的前身是《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该书出版至今26年来,王锦贵教授继续对这一主题不懈研究,即使2009年荣休后,仍投入极大精力研读、思考和撰写,一部60万字的《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终于告竣。这是王锦贵教授历经数十年不懈努力,倾毕生精力完成的代表作。

《通论》是当今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我国“二十六史”和中国纪传体文献的学术专著,集大成、富新意。该书以“二十六史”为经,以共性问题为纬,从“纪传源流”到“纪传经典”,逐一论述、论证、剖析和总结,揭示中国纪传体文献的来龙去脉、重要成就、重要意义、重要影响、重要知识点、重要问题等等,以求通过研究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